

高职院校连续扩招,“双师型”教师是改革方向,代表委员为此建言——

如何培养“上得了讲台,玩得转实训”的“工匠之师”?

本报记者 王维砚

“今明两年职业技能培训3500万人次以上,高职院校扩招200万人,要使更多劳动者长技能、好就业。”从去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高职院校扩招100万人”,到今年政府报告再提高院校扩招,佛山市技师学院装备制造系副主任杨珍代表,感受到职业教育越来越受到重视。

更多学生走进职校大门,也需要职教教师不断提升自身能力。

2019年,国家先后出台“硬核”政策加速完善现代职教体系,建设兼具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能力的“双师型”教师队伍都是改革方向。

受访代表委员指出,目前“双师型”职教师资培养仍存瓶颈,建议加快建立健全对“双师型”教师资格的认定标准和准入机制。

不愿分散精力“两头发力”

“培养出企业‘用着顺手’的学生,离不开‘上得了讲台,玩得转实训’的好老师。”杨珍代表口中兼具理论和实践教学能力的好老师,说的就是“双师型”教师。

杨珍代表告诉记者,在对职业院校进行评估时,对“双师型”教师的比例也有硬性规定。

但在现实中,一些职校教师却对成为“双师型”教师并不热心。

“目前职校老师在评职称时,主要分为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两个序列,成为‘双师型’后,在评职称和职业晋升上并没有明显优势。”中华职业教育社副理事长苏华委员解释说,无论理论还是实践,只要一方面“拔尖”就可以晋职称,这就导致一些在校教师不愿意分散精力“两头发力”,“宁愿多发论文、多搞点项目”。

杨珍代表建议,尽快落实对“双师型”教师在待遇提升、职称评定、职业晋升等方面给予倾斜的政策,增强成为“双师型”教师的吸引力。

“政策出台后,还需要有相应的检查措施保障文件落地。”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副校长许玲委员建议,以省为单位进行督导,确保职业院校在制定人才评价体系时有利于建设“双师型”教师。

教磨具的老师拿着会计证

关于“双师型”教师培养的另一个问题在于教师的资格认定和准入机制缺乏统一标准。

“这主要涉及谁来认定、如何认定、认定结果谁来鉴定的问题。”杨珍代表进一步解释说,目前,职教师资资格认定参照的主要是《教师资格条例》及《教师资格条例实施办法》,这些文件对于职教教师取得教师资格仅在学历上进行了明确要求,需达到本科或研究生以上学历,而对于具备什么样的职业资格并没有硬性要求。

“这就出现教磨具的老师,拿着与所学专业并不对口的会计证,也能被评为‘双师型’。”许玲委员指出,目前,各地各学校都是按照自己的标准认定“双师型”,没有统一标准,也就没有了横向的可比性。

许玲委员建议,在构建职业教育教师的准入标准时,突出强调教师应具备的职业资格,“这是职业教育的最终落脚点和归宿,也是最能体现职业教育特色的重要标准”。

明确认定机构和标准

2019年,国家出台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和《深化新时代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改革实施方案》中均明确,到2022年,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占专业课教

师的比例超过一半。

那么,“双师型”职教师在培养、任用与专业发展上的瓶颈究竟该如何打破?

代表委员呼吁,明确认定“双师型”的机构,以及不同教育层次、不同专业对“双师型”种类与水平的界定。

杨珍代表建议,设立由教育行政部门、人社部门、企业行业三方代表组成的资格认定机构。认定时,不能仅凭书面材料和证书,还要对实践教学水平“现场考、实地评”。

“对应用型本科、高等职业院校、中等职业学校的‘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要有区分度,不能一刀切。”许玲委员表示,中职属于高中阶段的教育,高职与本科属于高等教育,虽然都有“职业性”特点,但是对师资队伍要求并不同,应进一步细化政策。

苏华委员建议,对教师培训课程作出具体规定,实施以教师岗位职业能力为核心的,包括“职前培养”和“职中培养”的全过程“双师型”教师培养制度。特别要重视教师在企业实践的实效性,不能走过场,加大对职教教师“技能”考核的力度。

(本报北京5月26日电)



不同寻常的两会

虚拟演播室、虚拟主播、4K高清……伴随着新技术的发展,民众获得两会声音的方式更多元便捷。同时,考虑到目前仍处于疫情常态化防控的特殊情况,原本常见于在线直播的视频设备成为分会场“标配”,云旁听成为各部委倾听代表意见建议的创新方式。

左图:中国联通北京东单营业厅为今年全国两会搭建的虚拟演播室。

右图:5月23日,全国人大代表李玮在参加山东代表团分组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发言。通过代表面前的手机,有关部委工作人员连线旁听,听取意见建议。

本报记者 王伟伟 摄

新华社记者 吴雨 摄



代表针对就业歧视开出药方——

将反就业歧视纳入检察公益诉讼范围

本报讯(记者罗筱晓)“同样是回广西复工,一个留下,一个被劝返,就因为后者是湖北人。”带着一丝无奈,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律师蔡学恩代表向记者讲述了武汉“解封”后,一名湖北籍务工者的遭遇。

复工复产期间,蔡学恩代表接到了好几次类似这样的咨询,都是因为来自疫情严重地区而遭到歧视性对待。

4月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明

确要求,依法查处和纠正拒绝招录疫情严重地区劳动者等行为;4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召开会议要求,要严禁歧视湖北籍劳动者,坚决依法纠正个别单位拒绝招录、无故辞退湖北籍劳动者等就业歧视行为。

“在现实中,由于司法滞后性和招录工作时效性,劳动者错失的工作机会很难获得补偿。”蔡学恩代表说。

为此,蔡学恩代表建议将反就业歧视纳入检察公益诉讼范围,“这样一方面可以快速解决争议、减少诉讼成本,另一方面可以对实施就业歧视的用人单位产生警示作用。”

湖南省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教师江天亮代表则关注职业院校学生遭遇的就业歧视。江天亮代表发现,即使一名高职学生专升本进入本科,随后再攻读硕士学位,但当其

进入社会求职时,最初的低学历起点仍然可能成为就业的“拦路虎”。

一方面是职业院校扩招,一方面是就业时被“学历歧视”,江天亮代表建议,应扩大社区工作者、街道和村干部招聘岗位中的职业院校学生招聘录取比例,“职业院校毕业生同样能胜任这些工作,应该给予他们更公平的就业待遇”。

蔡学恩代表认为,遭遇就业歧视的人群有很多,歧视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无论是显性的还是隐性的,都要严厉打击。他呼吁,我国应尽快建立就业歧视识别、惩治和预防机制,有针对性地做好顶层设计。“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可以适时发布反就业歧视的指导性案例或者典型案例,最高人民检察院则充分发挥指导性案例和典型案例的引领作用,从而提升各级司法机关针对就业歧视案件的办案能力。”

“新基建”来了,技能提升也要“融合发展”

些高科技设备。

5G、工业互联网将会对整个制造业的生产流程带来改变,需要通过工业互联网把技术工人的个人技术和经验转变成数据信息,然后赋予到自动化制造、智能化制造的生产场景当中去。“这将会对生产流程、生产技术、生产环境带来改变,对技术工人提出了更高的挑战。”杨飞飞代表认为。

技能提升也需要“融合发展”

2019年12月26日,国内内燃机行业的领军企业玉柴集团新一代国六生产线全面建成投用。新生产线总投资达30亿元,整体装备能力处于世界先进水平,是目前国内信息化、自动化程度顶尖的智慧工厂。

“生产线运用了5G技术,上一道工序出了问题,哪怕是一颗螺栓没有拧紧,设备都会发出警报,不解决的话,下一道工序将无法进行。”玉柴内燃机装试工种技能大师、工艺技部新品试制装配工段工段长许燕妮代表今年的工作内容之一,就是开展技能大师工作室的全员培训,“培训内容之一是提升人和设备的结合程度,对新的工艺指导书的了解和掌握。我们不能墨守成规,在传统技能基础上,要增加数字化、智能化的新知识。”

近年来,李征代表的这种感觉也越来越强烈:越来越需要复合型技能人才了。他倡导建立终身学习体制。同时,在国家层面,产业工人的培养应该兼顾技术和知识两个层面,还要提高一线技能人员的科学素养。

“复合型高技能人才的培养不仅需要时间的沉淀,更需要国家的政策支持。”作为来自生产一线的代表,刘加军代表也在关注新基建下高技能工人的培养问题。“希望国家加大相关政策支持力度,继续加大对职业院校的投入力度,开展多方面有针对性的技能培训,培养更多的青年专业技术后备人才。同时,通过完善用工制度和加大培训力度,引进、培养出技术操作和实践技能型人才,才能打牢企业‘新基建’的发展基础。”

杨飞飞代表认为,随着5G、工业互联网的推进,未来技术工人的技能要实现“融合发展”,除了熟练掌握本专业技能,还需要对产品制造的全流程技术有一定了解,并拓展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方面的知识和技术。“我认为产业工人需要具备这种自我提升的意识。”

世界技能大赛冠军、杭州技师学院教师杨金龙代表则表示:“从职业培训的角度来说,在传统技能传授的同时,也应该注重数字知识、智能知识的教育,使劳动者具有实操技能的同时,也具备一定的理论基础。而在学历教育中,也应该加强劳动教育,使大家具有一定的实践能力,更好地适应未来的就业需求。”



(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二维码)

聚焦 两高报告 十大看点

1	惩治涉疫犯罪
2	高压反腐
3	扫黑除恶
4	助力脱贫攻坚
5	保护生态环境
6	防范金融风险
7	保护未成年人
8	优化营商环境
9	惩治暴力伤医
10	维护食药安全

(上接第1版)

建立支出型困难家庭的救助体系

一边是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一边是一些帮扶政策还存在薄弱环节。在采访中,怎么解决“因病因意外伤害致困”是代表委员们探讨较多的问题。

冯鸿昌代表所在的厦门港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职工如果因罹患重病或遭遇意外导致生活困难,可以根据困难程度获得来自市总工会、企业工会和行政多个层次的保障和救助。但即便如此,这些措施还不足以解决职工大病的困难。

“如果职工患病或因意外伤害致残,不仅面临高额治疗费的压力,还可能丧失劳动能力,不得不病休在家,收入大幅减少,其配偶也可能需要照顾他而无法工作。如此一来,微薄的收入根本无力支撑就医、子女教育、养老等开销。”冯鸿昌代表希望有关部门能进一步加大对这部分职工的帮扶力度。

不仅如此,他还认为,有的救助政策的门槛偏高,把一些实际上生活困难的职工挡在门外。一方面是救助认定的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偏低,另一方面,在考虑收入和家庭支出后,把机动车辆考虑进来一刀切,不太科学。“比如,有的职工收入虽然高过救助线,但其家庭负担重,必要的支出高,生活仍然困难。”

“近年来,安徽省委省政府将困难职工解困脱困纳入民生工程,取得了很好成效。但是,当前‘因病致困’是导致职工家庭困难的首要因素。”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总工会一级巡视员李素萍出示了安徽省总调研的一份数据:据统计,2020年3月安徽省工会在档困难职工中,因病致困的职工占比超过一半,以远超第二名的比例居致困因素首位。为此,她建议,深化和完善医改政策,提高职工医保报销比例,同时建立完善职工医疗保障制度,通过进一步加强对困难职工的医疗救助和医疗保障,切实解决困难职工因病致困的问题。

曾从事工会工作多年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董事长焦开河特别关注因重大疾病、子女就学、意外风险等致困的职工。他认为,有必要推动政府建立支出型困难家庭的救助体系。“推动将因病致困的职工纳入大病保险和医疗互助保险,建立完善重大疾病保险救助体系和支出型贫困家庭的救助体系,有助于从源头帮扶困难职工脱困解困。”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总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原主任李守镇则建议,健全分层分类的城乡一体化社会救助制度体系,将城市低收入人群体特别是重病重残家庭纳入社会救助保障范围,完善城市低收入群体家庭专项救助制度。

李守镇委员同时注意到新冠肺炎疫情给城市低收入群体就业、收入、生活造成的影响,为此呼吁加强疫情应对临时救助措施。“比如,财政部门在资金上支持对突发困难和临近贫困边缘的低收入职工开展临时帮扶和送温暖,增加向困难职工和低收入职工一次性救助,鼓励和支持工会开展在政府救助覆盖前的前置帮扶工作。”

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缓解相对贫困长效机制

“城乡相对贫困现象将在今后一段时间长期存在,扶贫工作重心将转向解决相对贫困,亟须研究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推动减贫战略和工作体系平稳转型。”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总工会原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陈荣书说。

他建议,在研究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纲要中,要通盘考虑农村和城镇的相对贫困问题,研究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缓解相对贫困长效机制,明确政府牵头和责任部门,制定具体的目标及政策举措等;研究并实施城市扶贫战略,特别是整体解决区域性、行业性的集中连片困难职工方案;进一步完善社会救助体系,着力解决现有社会救助“碎片化、断崖式和低保捆绑式”问题。

陈荣书委员还建议健全城市贫困预防措施。切实推进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劳动报酬份额占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比例。加大教育投入,增加基础教育投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实施全民参保计划,实现职工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包括“研究适应新的就业状态的社会保障模式,预先排除‘三新’就业群体未来退休时社会保险缺失可能的社会风险隐患”。

此外,实施以就业创业为核心的开发性扶贫脱困措施。加大结构调整和化解产能过剩企业及富余人员就业扶持政策落实力度,对资源枯竭城市(或矿区、林区等)实施特殊的就业扶持政策。健全失业监测统计制度,增强失业保险促进就业功能。

焦开河委员则着眼于巩固城市困难职工解困脱困成果,防止返贫返困。“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调整优化现有工会帮扶政策,推动政策、责任、帮扶等统筹接续,构建长效解困脱困机制。”

(本报北京5月26日电)